

「哲學教育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

專家對話(二)

迎接挑戰，超克困難 ——為臺灣的哲學教育開活路

葉海煙

基本上，個人相當同意苑舉正教授所揭露的臺灣哲學教育的困難與挑戰——其困難主要有「定義上的困難」、「應用上的困難」與「理解上的困難」；而其挑戰則有「商業化的挑戰」、「科技化的挑戰」以及「民主化的挑戰」。由此可見，苑教授雖身在高等教育的殿堂，卻仍時時刻刻心向人群，胸懷世界，並同時兼具感性與智性，而終於跳出了學術的白色巨塔與理論的灰色地帶。顯然，苑教授所謂的「困難」，大多源自於哲學教育過程中的教授者（他們往往自稱是「哲學家」）與學習者（他們或者對哲學全然無知，如同一張張白紙；或者一知半解，充滿疑惑，卻也同時心存偏見；或者，無法真正理解哲學並非旨在尋找固定的答案）。而苑教授認為哲學教育在台灣所面對的三種挑戰，則顯然有其結構性、集體性以及客觀性，不容吾人輕忽，更不許吾人閃避。也就是說，哲學教育在台灣的高等教育裡的重要性所以始終無法



得到真正的認同，而其效力與影響也一直被諸多社會性與文化性的因素所干擾，甚至被一些具有封閉性的價值意識所遮蔽所抑制；而其中緣由委實複雜而詭譎，除非我們盡釋前嫌，放棄各式各樣的本位主義以及各種偏執心態，否則又如何能從「坐而言」到「起而行」？例如相關主題的研討會與座談會的結論，再怎麼具有真知灼見且一針見血，只要所有可能染病之人（包括哲學界裡裡外外的人）拒絕療治，拒絕服藥，一切的努力都將是枉然的。

而難能可貴的是苑教授依然如此樂觀，如此積極，如此正向地提出足以迎接挑戰，超克困難的解決之道——他先肯定哲學教育的重要性，認定哲學教育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更是社會祥和的保障、文化發展的根基，而提出「理性溝通」的實踐策略，以及建構「社會共同體」的決心與努力。此外，苑教授還拈出吾人存在之價值與生命共通之意義作為哲學應用與哲學實踐最具核心意含的場域，如此洞見更值得所有從事哲學的「教」與「學」的有志之士細細斟酌。當然，苑教授以為哲學教育乃以全人教育為依歸，更是大處著眼，而且已然將哲學教育納入通識教育與大學基礎教育甚至是極其廣義的人文教育與社會教育之中。



在此，個人十分樂意提出兩點淺見，以就教於苑教授，以及所有關心哲學教育的朋友們：

(一)所有有志從事哲學教育者顯然必須先有充分的自覺——自覺作為一個哲學教育工作者一方面乃自有無上之榮耀，一方面則不能不謙卑自持而慷慨真誠地對待所有對哲學有夢想有憧憬的年輕人。目前，國內大學在競逐「卓越」、「頂尖」甚至「拔尖」而「攻頂」的過程中，似乎已將各個領域的教授們限縮且定格在各種專業的範域之中，哲學科系顯然也無能擺脫這一股「重研究而輕教學」的學術蠹害。此刻，且讓我們仔細聆聽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史丹福大學校長唐納·甘迺迪（Donald Kennedy）以身兼科學家與教育家的雙重身分所發展的一項聲明：

長久以來，教學與研究並重原本是大學發展的優勢，但最近幾年來，研究卻逐漸凌駕在教學之上。我強調，現在該是重申教育為大學主要宗旨的時候了，而社會也終將觀察各校是否善盡教育的職責，來判定大學的成敗。我還在這份聲明中列出一連串值得警惕的發展：一是許多教授挪用教書時間作為研究用途；二是各校教學過度借重訪問教授與代課老師；三是各校審核教授升等的過程中，並未肯定教師傑出的教學表現。我也注意到史丹福大學雖然相當注重教學，但並沒有系統地改善老師的教學狀況。教書不是教授日常的共同話題，雖然它應該是教授這一行工作核心，卻絕少成為大學老師關切的焦點。我們更極少提到課堂教授之外的教學活動，例如作學生的顧問，我們也



絕少為何者是所有學生必須知道的知識而爭辯地面紅耳赤。(唐納·甘迺迪著，楊振富譯：《學術這一行》(Academic Duty)，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0年，頁127~128。)

就是因為哲學本就有「助人」的功能與目的，所有以哲學教育為志業者，又如何能輕易地把自己禁囚在抽象概念的重重窠臼裡？縱然嚴格的方法訓練與思考鍛鍊絕對有其必要，但是一旦走出研究室，邁入大講堂，或是步入眾人會集之所，「哲學家」的尊嚴與榮寵難道不是在雙向的交流與互惠的溝通之中纔能變得真實而堅實？而哲學教育之普及於當代社會並遍潤世道人心，又豈能單靠一些期刊論文的撰作以及某種艱澀理論的深度演繹？

(二)在人文與科技嚴重失衡的這個時候，引領更多的年輕人親近哲學，靠向哲學，甚至昂首進入哲學的堂奧，並不在於一味地增加以哲學為主修的學生數量，而是在於增強大學基礎教育裡的哲學能量——包括一般的哲學基本科目，以及將哲學與其他學科相互融通涵攝的跨領域課程，如當代的應用倫理，便可能發展出具延伸性、穿透性與未來性的新課程，其中甚至可以包含一些行動課程與潛在教育裡身心和合、手腦並用以及人我交往的多元的教育元素。也就是說，當代的哲學可以「很哲學」，也可以「很不哲學」。原來，哲學沒有定型，沒有固態；哲學唯有在人文流動之中，在社會脈動裡，纔可能不斷地獲得足夠的動力與滋養。嚴格地說，臺灣的哲學教育一直不夠人文，不夠通識，不夠親近一般人的心思與懷想。而哲學專業人士也一直缺少和其他專業



人士之間的交流與對話。十二年前，我個人就曾經以「哲學教育在台灣的回顧與前瞻：背景、前景與願景」為題，強調「哲學對話」的重要性，並認為「多元展開」乃哲學發展的必經之路，同時揭櫫「人文與科技的對反與融通」，實乃大勢之所趨：「自上一世紀下半葉以來，由於『普世化』趨勢乃所有人文不能不面對的實存境況，台灣哲學既置身於全球文化共存共榮的大環境中，也便不得不在普世化的推波助瀾之下，一方面分享所有人類共有的智慧財產，特別是古典與現代相互照應的人文成果；另一方面，則必然要對當代社會中人文與科技對立而互通的生存與生活課題，進行具批判意義的反思。」（《文訊雜誌》，2001 年 12 月，頁 41。）而十二年後的台灣哲學界卻依然得面對形勢越來越嚴峻的文化失衡，以至於人文資源日益貧乏、價值意識日漸淺薄的社會困境，其中艱辛，其中苦楚，其中訴不盡的無奈，又怎能不教哲學園地裡的耕耘者如料峭春寒中的嫩枝新葉兀自抖擻出點點的風姿與精采？

在此，我們甚願掬誠祝禱：哲學家終究不會孤單，哲學教育也終究不會如沙河涸竭，只要人文長存，人道永固，人性始終不沉淪不墜落不敗壞。

